

日本侵華內幕(八)

石射豬太郎著
陳鵬仁摘譯

盧溝橋事變前後

譯者按：日本侵華內幕一至七節摘譯自日本外務省東亞局長森島守人的回憶錄，八至十節則摘譯自森島守人後任石射豬太郎的回憶錄。敬請讀者注意。

近衛本領令人懷疑

一到東京，便受到外相佐藤(尙武)的邀請，並被任命為東亞局長，與前任者森島(守人)辦理移交，一點休息時間也沒有。

這時，林(銑十郎)內閣於三月底突然解散國會，正在大選中。

當時外務省在次官堀內(謙介)之下的局部長是歐亞局長東鄉(茂德)、通商局長松島(鹿夫)、條約局長三谷(隆信)、美洲局長吉澤(清次郎)、文化部長岡田(兼一)、情報部長河相(達夫)和調查部長米澤(菊二)。東亞局的課長是：第一課上村(伸一)、第二課佐藤(信太郎)和第三課花輪(義敬)。這是我自任通商局第三課長以來，隔十三年後第二次在外務省服務。佐藤外相與我的緣分，沒有一個月；因為大選結果，林內閣失敗，所以於五月間提出總辭職。

職。

六月初，近衛(文麿)內閣在國民期待中成立，廣田(弘毅)就任外相。據說這是應近衛懇求的結果，而且是以副首相的身分入閣，但我對廣田外相毫不覺得新穎或期望。自駐美大使館時代(石射和廣田這時同過事——譯者)我對他的崇拜和期待，這幾年來急速地減少。理由是，去年廣田組閣時，對軍部的要求他唯命是聽，更恢復軍部大臣的現役制等，使我對他感到失望。我雖然相信廣田是個真正的和平主義者和國際協調主義者，但我卻同時覺得廣田是個對軍部和右翼抵抗力很弱的人。

近衛首相在日本國內擁有絕對的人望，中國和其他國家對他也抱着很大的期望。日本最好的家世，西園寺(公望)元老(日皇的岳父——譯者)希望之所託，富有革新思想的人物，為軍部中堅所支持的人，長得又帥，他以時局所期待的首相，而為報界所歡迎和讚揚，並受到國民熱烈的愛戴。他起用報界出身的風見章為書記官長，所以製造輿論是這個內閣的拿手。婦女和小孩也敬仰他。在女中讀書的我的姪女參觀國會後回來

說：「穿大禮服上講臺的近衛先生帥極了；叔叔穿的西裝太鬆，不好看。」她甚至於用我來歌頌近衛。

這種淺近的讚美暫且不談，但對於近衛的人望，我總沒有好感。綜合其親信所談，我對他所得的評價是：「沒有本領的知識分子」。我跟他認識，是幾年前晚春，我到鎌倉他的別墅去訪問他，談論中國問題的時候，我對他的盛名，早已開始懷疑。

廣田被牽著鼻子走

中日關係的大局，比諸大約十個月前我離開上海的時候並沒有什麼改善。調整國交的中日會談，因去年(一九三六)十一月的綏遠事件以來一直中斷。佐藤外相於今年春天在國會所表明的立於平等基礎的中日國交調整論，以及五月間回國的川越(茂)大使的對華再認識論，雖然都為中國所歡迎；但為中日關係之癥結的華北的現實，卻使兩國的關係日趨惡化。扮演緩衝中日關係的主角之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因忍受不了欲特殊化華北的日軍要求，遂以掃墓為藉口

，同其故鄉山東而不返任所。因此日軍在着急；國民政府絕不許華北特殊化。

國民政府的強硬態度，自以綏遠事件以來全國性的對日強硬輿論，和以西安事變的轉機，似乎成立國共之間的「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的妥協為其根據。

從華北的日本使領館，不斷地傳來日軍所惹起的險惡空氣，其情勢相當嚴重；但日本又沒有消除它，從而調整全面國交的具體政策，當然更不能提出廣田三原則。

我以為我既然做了局長，自應該拿出辦法，因此一上任就從大處着眼，來構想我的對華私案。我本想用它作為跟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私下會談的腹案，惟因蘆溝橋事件，一切功虧一簣。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拂曉，我因為外務省來的電話而跳起來。無需說，這是蘆溝橋中日兩軍衝突的情報。真糟糕！我坐上來接我的車子到外務省，時為六點左右，院子內沒人影，是很清爽的早晨。到情報部去，部長河相已經上班了。「終於開始了」，「希望不要擴大」，我倆做了這樣的會話。主管課的東亞局第一課的首席事務官太田（一郎）已經在那裡工作。

廣田大臣上班後，次官堀內、歐亞局長東鄉和我，遂與廣田外相聚會。當然，大家都贊成不擴大事件和就地解決的原則。北平的大使館，陸續地來電報。電報說，事端是因為中國軍的不法射擊而開始的。但知道九一八事變之來龍去脈的我們，都異口同聲地說：「又來了。」不過，無

論那一方先動手，當前的課題是趕緊解決事件。

當天上午，陸軍省軍務局長後宮（淳）和海軍省軍務局長豐田（副武）來我辦公廳，決定不擴大事件的方針。對於中國問題，一向有陸海二軍務局長和東亞局長隨時聚首外務省商量的慣例。這就是所謂三省事務當局會議。

下午召開內閣會議，決定不擴大事件和就地解決的方針，並訓令陸、海、外三省的駐中國機構這樣做。於當地，在二十九軍和日軍對峙中，開始了善後交涉。

經過不安的兩天，連星期日也召開了緊急內閣會議，因此十一日一早就上班，東亞一課的事務官太田看到我使很憤慨地說，剛才陸軍省軍務局的聯絡員來說，在今日的緊急內閣會議，陸軍大臣將提出動員三個師團的案，所以請外務大臣來反對它，使它流產；太田反駁對方說，你們為什麼不自己去阻止其提案，這種作法實在太卑鄙。無疑地，這是陸軍內部意見不統一的暴露。在當地既然在交涉解決中，為什麼還要提出動員案？不要來拜託，外務省一定也要反對。

當天上午九時，我到東京車站去迎接為了參加內閣會議，從週末去鶴沼靜養而回來的廣田外相。我在車子裡向他報告軍務局聯絡員的話，並建議他在內閣會議時能阻止這個動員案，因為此時絕對不宜刺激中國當局；他點了頭。

可是，當天的閣議卻很簡單地通過了動員案。從閣議回來的廣田說，這個案附有一前提，就是需要保護日僑和為駐屯軍的自衛所，必要時纔要動員；亦即是為預防萬一的動員準備案，所以在

原則上無異議地予以通過。由於廣田這樣被軍部輕取一會合，所以我和東亞一課對外相非常失望。

根據閣議的決定，當天晚上內閣不但發表「做重大的決心，關於派兵華北，政府決定採取其認為必要之措施。」的聲明；而且翌日晚間，邀請政界、言論界和工商界的領袖們到首相官邸，由首相親自要求他們對政府的決心予以瞭解和支持。這時，官邸好像在做拜拜。似乎是政府本身要領頭擴大事件的樣子。

過去，每發生事件，政府都落後一步，而為軍部牽着鼻子走。據說這次首相如此做，是採取其親信的想法，不如由政府先出手，使軍部退三步，以利事件的解決，於是大吹大擂，以壯其勢。開玩笑，這無異是用肉包子打狗。

解決方案提交外相

至此，從正面已無用武之地，於是我決定以當時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石原（莞爾）少將為從事幕後工作的對象。大約一個月以前，外務省的幹部會邀請石原來交換意見時，他斷然說：「日本國防上應該最關心的是抵制蘇聯，對中國要用兵是荒謬絕倫，祇要我活一天，我不出兵中國。」石原的這句話，使我決心這樣去做。

記得七月十三日，因為情報部長河相的斡旋，我在平河町的河相宅偷偷地跟石原會談，河相也出席。我對石原再次確認其「不出兵中國」的決心，並相約了就地解決事件的方針。石原要我保密這個會談，因為軍部內的一些人和右翼跟蹤得很厲害。這說明了石原在軍部內立場的困難，

但負責作戰用兵的他既然這樣說，我便以為可以
避免動員出兵而覺得有點輕鬆。

在當地，十一日，中日之間成立了解決條件，
於此同時，逃到山東的宋哲元已經回來開始處理
事件；因為參謀長橋本（羣）的統制有方，日
軍很平靜。如果這樣下去，數日中事件似可獲得
解決。

解決事件的交涉，在南京也同時進行。事件
發生之前，大使川越出差華北，代館的參事官日
高（信六郎）受外務省訓令，與中國外交部從事
交涉。國民政府當然是不擴大方針，外務省的立
場是：堅持當地所協定的解決條件，不能侵害中
國的主權。

七月十八日，雖然是星期天，我仍然上班，
黃昏時刻，書記官長風見打電話來，請我到首相
官邸，並要我對中日問題的解決方案表示意見。
因此我說明了除我平素所想的方法以外無從打開
國交的大概。此時我對書記官長說：

「如果錯解決這個事件，日本將斷送其前途
。不知近衛首相的覺悟如何？」

「皇室與近衛家的關係不同尋常。由於皇室
和近衛家的這種關係，不許像過去的首相那樣，
無法對付時局辭職了事。近衛內閣一定要負責解決
事件的全部責任，所以請你放心。」書記長風見
這樣大言說。

「既然如此，那就更應該採用我的解決方案。」
於是我回到外務省之後，遂把我的私案寫成
書面，送去給他。他竟向我求取解決方案，實在
令我欽佩。於此同時，我也向廣田外相提出我的

私案，並報告他，我與書記官長會談的經過。

辭職未准靜觀變化

十一日日本政府的重大決心聲明，如所逆料
非常刺激中國政府當局，而且已經傳來了中央軍
的北上。加以廬山會議中的蔣介石先生，於十
九日發表了重大的聲明。在前年六中全會的演說
，蔣先生說中日國交還沒到最後關頭，故不該輕
言犧牲，以壓住了激進的抗日首領；可是這次演
說，他卻宣言最後的關頭到了，並告訴國民他維
護中國主權的決心。蔣先生終於說出最後的關頭
了。攔住中日國交之破裂的堤防決口了，於是情
勢日加嚴重。要應付此種情勢，實唯有慎重日方
的行動。可是，政府竟應陸軍的要求，於二十日
召集閣議，以便通過三個師團的動員案。

當天上午，我、後宮和豐田三個人討論了動
員問題。海、外兩局長絕對反對，後宮局長他個
人反對，惟因陸軍部內和國內的情勢，認為動員
是不得已的。亦即他受着部內強硬論者和右翼的
壓迫。我們在意見對立中散會；我向外相報告了
以上的經過，並請他在閣議能妥善應付。

閣議從上午開始，但一直沒結論，因此從黃
昏七時半又重新召開。我覺得外相的態度猶豫不
定，所以我令東亞一課寫了封請願書，趕往首相
官邸去找將要出席閣議的外相。在閣議室門口我
找到他，因為沒有時間做口頭說明，因此我請他
看看請願書。請願書的內容大約為：動員將是擴
大事件的開端，必然招致難以恢復的情勢，所以
為中日關係百年的大計，請在閣議奮鬥，並由我

和上村聯署。我把它當做最後一分鐘的打針。

爾後我回外務省，以等待閣議的結果。外相
於晚上十一點多鐘，由閣議回到官邸來；我跑去
看他，他竟說，動員三個師團的案子，沒經過什
麼議論就通過了。我非常洩氣。「我已決心辭職
或停職而回家。」（我的日記）

翌日（二十）早晨，我和上村第一課長決心
辭職，而帶着事務官太田替我們寫的辭職書面謁
外相。我說，沒有採納我們事務當局的建議和請
願，並贊成動員，意味着對我們事務當局的的不信
任，然後把辭職書呈給他，他竟這樣說：

「你們既然是站在規勸部下聯袂辭職的立場
，為什麼要聯名辭職？」

「聯署是一種方便而已。請您把它當做分開
的辭呈。」

這樣答後，我又問他動員問題。外相竟大發
雷霆說：

「任嘴！連閣議的經過都不知道，還要講什
麼！」由於我從沒見過這樣的廣田，因此瞬間有點
張慌失措，但我又繼續說：「令您生氣很對不起：
……這時外相恢復冷靜的語氣說：「陸軍大臣說
就是實施動員，除非情勢急迫不出兵，而且當地
的情勢也正在趨於解決，所以請撤回辭呈，以靜
觀一段時間。」我們的意見，他是非常瞭解的。

外相一這樣冷靜下來，我的「鬪志」便隨之
而鬆懈，再跟他爭也於事無濟，祇要事件獲得解
決就行。於是我說：「知道了，我們願與您共同
奮鬥。」而匆匆離開了外相的辦公廳。我們很巧
妙地給外相哄走了。

這天下午，軍務課長柴山（兼四郎）帶來了好消息。是即事件一發生，柴山便趕往華北，去看當地的情勢。回來後他說，當地非常冷靜，並逐漸在實行解決條件，因此沒有增兵的必要。而且柴山已經把這種情況向上面報告了。加以當地的參謀長橋本拍來無需援兵的快電，所以前途相當地光明。我的日記這樣寫着：

「從當地回來的柴山課長已呈報意見，天津軍也有無需援兵的來電，據說軍部已經暫時延緩動員，陸軍大臣對外務大臣也這樣說。由此，東亞局第一課遂元氣百倍，構想今後的和平工作。」

二十三日，陸軍發表了當地協定的內容及其實施狀況，這說明了事件接近於圓滿解決。那天，從上午就召開三局長會議。陸軍方面由柴山課長以代理的身分出席。就善後交涉的方針，我們大致上達成了協議，已經看到曙光了，可是陸軍卻還在介意北上的中央軍，因而軍務局長後官來央求外務省要對南京設法使中央軍撤退。我以為祇要事件獲得解決，便不必做這種工作而予以拒絕。二十五日，南京的日高、高宗武會談表明，國民政府有意默認當地協定的解決條件。太好了，下一個步驟祇剩下從大局來調整中日的國交。我爽快極了。

三個魔鬼聯袂而來

但這祇是曇花一現，從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因為郎坊事件中日兩軍互相鎗擊，形勢為之大變。第一線的情報仍然將其責任歸諸於中國軍的不法射擊；但我卻認為其動機是由日軍下層不必

要的動作而引起的。總之，日軍因為這個事件態度硬化，而向宋哲元將軍提出最後通牒，要求二十九軍全面撤退到保定方面，否則將採取自由行動。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為國防所養的狗，在這裡不分養主，又想咬人了。

魔鬼並沒有單獨來。二十六日黃昏，欲從廣安門進入北京的日軍，受到城牆上面中國軍的射擊。日軍認為，其非在於中國軍的故意或誤解。自發生事件以來，一直堅持要就地解決的參謀長橋本，似乎已經壓不住軍部內的興奮；而更壞的是，其部下有一個著名的策略家和知（鷹二）中校。

在另一方面，被最後通牒迫得走投無路的宋哲元，遂報告中央政府，與其接受屈辱的條件，不如選擇抗戰的決心，並請求中央政府的支援。對於日本陸軍軍部內的強硬派來講，這是他們求之不得的情勢。陸軍對於二十七日的閣議通知動員三個師團，並向正在召開的臨時國會要求事件費九千七百萬元。國會不但照原案通過，而且決議感謝派在華北的官兵；不特此，政府更發表聲明稱讚軍事行動呢！

二十八日凌晨，「皇軍」開始其「懲罰」二十九軍的戰爭。新聞界歌頌政府的決心，民衆為戰爭而興奮。情勢急轉，烽火衝天，束手無策。說不出兵中國的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石原到那裡去了呢？加之，於二十九日，日軍的傀儡冀東政府的保安隊一千五百人起來叛亂，殺傷了通州日軍守備隊以及領事館警察和日僑大約兩百五十個人。這是日軍的大意所導致的慘劇，但日軍卻將罪過歸諸於二十九軍的煽動。至此，二十九軍遂

遭遇到非被「懲罰」不可的命運。魔鬼是三個聯袂而來。

日皇企圖外交解決

如此這般，在第一線開始了全面性的「打架」，但於此時，日皇表示了意見。根據廣田外相的說法，二十九日晚上，日皇召見近衛首相說，這時是不是可以外交交涉來解決問題。大概是這個意思傳達到陸軍的結果，三十一日，軍事課長柴山來看我，問我有沒有令中國方面提出停戰的可能。為了面子，陸軍不自動提出，而要由中國方面提出停戰問題。我說有，如果將我的全面調整國交案與停戰交涉同時提出的話，有停戰的可能；因而我向柴山說明了我的國交調整案。柴山瞭解我的構想後就回去了。

在這裡，我想談談柴山這個人。我跟他於二十幾年前偶然認識，而變成無所不談的朋友。根據我所知道，最近的柴山是陸軍部內最正確認識中國的一個人，而由於其公正的意見，他常常受到其同仁的圍攻。這個柴山，現在以軍事課長的身分，與東亞局接觸。自發生事件以來，雙方的理解很快，我倆的意見也大多一致，就我來講，他是陸軍部內唯一能談中國問題的人。而且他足智多謀，據說又為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所信任。

八月一日下午，我對陸軍省課長柴山及海軍省軍務局第一課長保科（善四郎）就停戰交涉和全面調整國交案說明了我的腹案。這個腹案是，把停戰案和全面調整國交案交給好回來東京的

在華紡績同業會理事長船越辰一郎，請他趕回上海一趟，以他所仄聞日本政府的意向，暗中示之於高宗武，試探有沒有接受的可能，以便尋求外交交涉的線索。爲什麼要繞這樣大的彎呢？因爲中日兩國政府相繼發表重大決心的聲明，並正在大喊大叫斷然要懲罰和徹底抗戰的時候，如果突然提出停戰案和全面調整國交案的外交交涉，實在太微妙。因此，我便先透過私人，暗示對方以收拾局面的可能性，使其解開國民政府的抗戰意識。對方是一向熱心於中日和平的高宗武，這邊是與高氏有深交的船津。上述兩案對高氏如果有吸引力的話，自可發現交涉的線索。這是我的構想。

陸海兩省的課長都贊成我這個構想。海軍方面對這個構想，我想不會有意見；柴山說，他要按照這個構想去統一部內的意見。

我把這經過向大臣和次官報告，並承蒙他倆的嘉納，爾後去訪問隨侍其正在東大醫院住院的夫人的船津。船津以其夫人病重不肯答應。我說這是廣田外相的懇求，這樣纔說服了他。其夫人的確病危，但實在也不得已。

三省事務當局一致的意見，遂爲上司所採納，陸、海、外三大臣和三次官之間，由之各舉行了幾次會談，同意了全盤的方針。與此同時，三省事務當局會議草擬了要給高宗武的具體案。兩個案，都是從大處着想，以東亞局的案爲主。如果這樣中國方面一定會接受進行交涉的預想，使我勇氣百倍。我八月四日的日記有這樣的記載：

外務次官、陸軍次官會談

根據會談結論，黃昏，保科、柴山、上村三課長共同草擬停戰案和調整國交案，兩案逐漸具體化。這如果能順利，可以實現中日的和睦與東方的和平。日本和中國都將恢復其正常的心理狀態，這是何等貴重的工作。

雖然還沒有成案，但我對船津說明案的內容，請他搭乘四日下午九時半由東京車站開的火車往上海出發。我對他約定，一成交案，我將把全文電告上海總領事，同時，電知上海總領事以船津的使命，並訓令他請紡績同業會提理事安排高宗武和船津會面。該訓令特別提醒，這個會談在形式上是出自船津的意思，外務機構不要插手。

希望停戰調整國交

三省事務當局所商定的具體案，經由陸、海、外三大臣會議同意，電告上海總領事是七日的凌晨。兩案的要點如左：

停戰交涉案的要點：

一、取消塘沽停戰協定，和以往華北的一切軍事協定。

一、創設特定範圍的非武裝地帶。

一、取消冀察、冀東兩政府，由國民政府任意行政。

一、日本駐屯軍的兵力，要減到事變前的數目。

一、停戰交涉成立以後，中日雙方應該將過去的事情付諸東流，進入爲真正實現兩國親善的新交涉。

調整國交案的要點：

一、中國要承認滿洲，或者隱約約定今後不提出滿洲國問題。

一、中日間成立防共協定。

一、中國要全國各地徹底實行邦交敦睦令。

一、取消上海停戰協定。

一、廢止日機的自由飛行。

一、增進兩國間的經濟、聯絡和貿易。

上述停戰交涉案之所謂新交涉裡頭，有考慮到對中國的經濟援助和廢除治外法權，但這準備在調整國交交涉的進展過程中逐漸具體化。又調整國交案中承認滿洲國一點，對中國來講當然是不可能的，惟因我們在事變前得到國民政府內部有對於爲中日間之癥結的滿洲國最好不要再提起之意見的可靠情報，所以纔提出「今後不提出滿洲國問題」這一條。

船津會談尚無結果

根據上海總領事來電，提理事已經與高宗武取得聯絡，並安排了九日在上海，高、船津可以舉行會談。預定表進行得非常順利。此時，川越大使由華北返抵任所，這是八月八日的事情。

大使川越於發生事件前不久，前往青島靜養；事件一爆發，他便北上北京和天津，以注意事件的解決；但這種時候大使的使命是，在與國民政府的折衝。外相曾經幾次訓令他趕緊返上海任所，但他卻一直逗留天津不動。不得已，由次官堀內提議，以返國述職中的漢口總領事三浦（義秋）爲外相的返任督促使，去見川越大使。

七月下旬的臨時國會，抨擊川越是應該的。

對於在這重要關頭，大使竟不在任所是在幹什麼的攻擊，外相廣田真是陷於窘境，他祇有對質詢議員道歉說正在督促其返任所中。

這個川越大使，終於回到上海來了。回來東京的總領事三浦復命說，他抵達天津時，川越大使已經對當地的情勢絕望，並決心返任所。

回到上海的川越，一聽到船津的使命，便對船津說，他要跟高司長會談。總領事岡本以外相曾訓令當地外務機構不要插手這個會談而反對他，但川越卻不聽。

倒霉的是船津。既然請出來了高司長，船津便不得不於九日所約定的時間與高氏見面，但卻沒談到外務省所給予的使命，而以那時被釋放的抗日救國聯合會首領沈鈞儒等一夥的事為話題，並為上海局面的和平，希望他們嚴格取締排日活動，以混過去這次的會談。

在這以後，纔舉行了川越、高會談。會談的情形，川越雖然有電報來，但我已不記得它的詳細。現在我祇記得這樣：在該項會談，川越告訴對方日本的態度很寬容，說明和平解決的可能和需要；至於停戰案和調整國交案的具體內容，他並沒有全盤地轉告高宗武。我的日記這樣寫着：川越大使與高宗武的會談，試探試探是可以的，但阻止船津，打岔與高宗武的會談實在不太應該，除非給對方機會，對方是不會積極的。船津是為這工作而來的呢！

在上海的這種齟齬的演變，使我對陸海兩軍失去面子。駐外機構之無視訓令，並不只是陸軍。惟縱令照預定舉行了船津、高會談，也不可能

有好的結果。因為以船津、高會談那天黃昏所突發的大山事件為導火線，上海的局面遂錯亂得一塌糊塗。

大山事件局勢惡化

自發生蘆溝橋事件以來，在表面上，上海雖然保持着平靜，但華北的砲火隨時有引起第二次上海事件的可能，因此中國方面遂秘密地在加強上海一帶的防備，並侵犯從第一次上海事件以來就存在的停戰協定區域。這些情報使日本陸戰隊非常神經質。海、外兩省，對現地當局訓令要避免造成第二次上海事件。

正當此時，竟發生了大山事件。事件發生地的紀念路，是共同租界的行政權所及的所謂西部越界路的一條，路面的外側是中國的行政區域。這是八月九日黃昏，陸戰隊的大山（勇夫）中尉與其一個部下，駕車在紀念路中，為中國保安隊所殺的事件。

總領事岡本請求發動英國、美國、法國和義大利的停戰協定委員，以俞鴻鈞市長為對手，俾解決事件和消除當前的危機，但他的努力卻都沒有奏效，局面則日趨惡化。這時如果開始戰端，陸戰隊將面臨危機，因此海軍遂由佐世保急派一千名增援隊到上海。不消說，中國把它當做日本決心戰爭。這個增援，據說沒有經過政府的承諾，而在海軍的權限內所採取的臨機措施，所以無工夫去阻止它。在祇為打勝目前的戰爭，而不顧外交和全局，逐鹿者不看山這一點，陸軍和海軍並沒有什麼兩樣。（未完待續）

浩然集

喬家才著

本全集共收集喬家才將軍精

心傑作「鐵血精忠傳」。「戴

笠和他的同志」。「關山煙塵

記」。「海隅叢談」四巨册精

裝合訂為「浩然集」一部定價

台幣捌佰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

訂購「中外雜誌」贈送親友

是最高級的禮品，他（她）

會每月想起你的友情。國內

全年新臺幣陸佰元，國外全

年美金貳拾壹元，航空另加

郵費。請撥電話五三六五三

一一。五三六六八六六。